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思考与新探索*

王纪臣 郭文亮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习近平在继承前人探索成果的基础上，在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重大变化的新时代，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进行了新思考和新探索。一是从理论维度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强调权为民所授、利为民所谋，以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面对的权力认识问题；二是从制度维度先后出台和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为破解历史周期率制度困境构建了一套长效机制；三是从实践维度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自我革命，以探索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具体路径。习近平的这些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不仅为中国共产党从根本上跳出历朝历代都难以破解的历史周期率难题指明了方向，而且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关键词】习近平 以人民为中心 权力制约监督 全面从严治党 历史周期率

作者简介：王纪臣（1986-），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江苏南京 210023）；郭文亮（1953-），中山大学党史党建研究所所长、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广州 510275）。

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执政地位以后，为避免重蹈历史上历代统治者“人亡政息”的覆辙，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从严治党，砥砺前行，努力探求跳出历史周期率^①的有效路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前人不断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面对新时代面临的新挑战与新要求，对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进行了新思考和新探索。他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明确提出：“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②此后，习近平在不同场合多次重提这一问题，不仅表明了他深切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也彰显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勇于破解这一历史性难题的坚定决心和必胜信心。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研究”（18JJD 710002）和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创新项目“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历史与逻辑研究”（NJUDPGRA_201803）的阶段成果。

① 历史周期率：1945年7月初，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延安考察访问，黄先生自己的人生阅历和长期思考向毛泽东提出了历史周期率这一困扰无数执政者的千古难题。他意味深长地说道：“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溘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为此，黄炎培先生请教毛泽东，中国共产党能不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后来，有人称此次著名谈话为“延安窑洞对”或者“黄炎培难题”。参见黄炎培：《八十年来》，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204-205页。

② 《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15年，第6页。

一、以人民为中心：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理论思考

习近平善于从理论的维度指导实践、引领未来。针对历代君王上台前强调“民贵君轻”，视民众为衣食父母，而上台后则变为“君贵民轻”，视民众为鱼肉对象，导致深陷历史周期率难题而不能自拔的深刻教训，他从坚定党的理想信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密切党群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与思考，要求当代执政者必须树立“权为民所赋”和“利为民所谋”的观念，以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必须面对的权力认识问题。

一个政党或政权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首先是从掌权者对权力来源和掌权目的的思想认识开始的，而这种思想认识又与其秉持的理想信念密不可分。如果掌权者在思想认识上忘记了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忘记了掌权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兴盛，就必然脱离人民，而最终被人民所抛弃。中国古代历朝君王深陷历史周期率而不能自拔，从思想认识上来说，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只知道利用人民获取权力和利益，而一旦获得权力就抛弃人民，甚至千方百计地去榨取人民利益供自己挥霍享受。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苏共失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理想信念而被人民群众所抛弃。因此，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权只有始终不渝地坚定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和理想信念，才能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也只有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才能真正跳出历史周期率。

坚定理想信念和宗旨不仅是激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动力，也是确保执政党破解历史周期率魔咒的理论密码。毋庸讳言，在面临新环境、新任务和新问题的时代背景下，有少数党员干部出现了淡化为人民服务观念，甚至伤害人民群众利益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及时有效解决，党就会变质变色，丧失执政资格，最终陷入历史周期率的泥潭。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始终坚持和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必须落实到社会发展实践中，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只有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想问题、办事情、做决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始终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全力化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们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成效都不是由自己说了算，必须而且只能由人民来评判。人民是我们党的工作的最高裁决者和最终评判者。如果自诩高明、脱离了人民，或者凌驾于人民之上，就必将被人民所抛弃。”^①也就是说，时代是出卷人，中共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积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认真倾听人民声音，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而汇聚起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磅礴动力，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要得到贯彻落实，还必须找到一个科学的思想路线和有效的工作机制，即坚持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关系。坚持群众路线和密切党群关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有品质，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本和力量之源。新中国成立后，在已经取得执政地位和不搞多党制选举的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8页。

情况下，中共还需不需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密切党群关系？“一个政党，只有顺民意、得民心、为民谋利，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作为执政党，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背离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些公仆就会被历史所淘汰。”^①也就是说，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公仆与主人的关系，如果党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切实做到“利为民所谋”，人民就会把赋予党的权力收回。习近平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高度，深刻总结古今中外政权更替的历史教训，科学地解决了当代执政者对待权力来源和用权目的的思想认识问题，从而为跳出历史周期率筑牢了拒腐防变的思想堤坝。

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建设

影响一个政党或政权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制度建设因素。因为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以及长期性特征。在制度建设中，权力制约监督制度建设最重要。权力是一把双刃剑，运行得当有助于政权的巩固，反之则危及政权的生存。历代君王之所以难以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原因固然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权力完全没有制约监督，导致权力腐败，最终被人民所抛弃。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垮台解体也与其缺乏权力制约监督机制有关。因此，加强权力制约监督制度建设就成为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因素。

自从权力运行中发生滥用与腐败现象以来，人类社会就一直在探索怎样对权力加以严格有效的制约监督。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其实也有这方面的探索，陆续建立了一些监督机构和法律法规，对权力有序运行起到一定的监督制约作用，但其探索带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一是重单向监督而轻双向制约，即只有权力监督部门对权力执行部门的单向监督，而权力监督部门自身不受对方制约，如明朝的“东厂”“西厂”；二是只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没有下级对上级的制约，尤其是最高统治者皇帝不受任何制约监督；三是重人治监督而轻法治监督。监督与不监督，或监督力度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认识与意志，这种不严格、不规范的权力监督制约行为导致封建王朝最终难以跳出历史周期率。相对来说，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探索权力监督制约制度建设方面有很大的进步，逐步形成了较为完善和规范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其中既有权力监督部门对权力执行部门的监督，也有权力执行部门对权力监督部门的制约；既有中央对地方的监督，也有地方对中央的制约，包括最高统治者也要接受监督制约。但也有其阶级局限性，即形式上比较严格规范，似乎任何权力都受到监督制约，但在私有资本控制下，实质上并不能真正体现人民群众对权力运行者的有效监督制约，最终不过是少数掌权者内部自己监督制约自己而已。由此可见，权力不仅需要监督制约，而且需要探索一种科学有效的监督制约制度。为此，习近平根据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理论，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党情，初步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的制度体系，为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一是加强党内权力监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重视党内权力监督制约制度建设。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②。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增强党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

①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16-217页。

② 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页。

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日常管理监督。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①。近年来，党中央先后修订和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以下简称《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一系列党内法规，逐渐构建了结构合理、系统完备和运行有序的权力监督制约制度体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党内监督条例》，这个条例全文共47条6700余字，但言简意赅、简明实用，被称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利器，科学回答了“监督谁”“谁来监督”“监督什么”“怎样监督”等党内监督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是党内监督走向精细化、系统化和法治化的重要标志。《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党内制度法规的出台和落实，无疑对于进一步完善党内权力监督制约制度体系，努力破解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跳出执政兴衰历史周期率难题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加强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任何权力要实现有序运行，除了要加强内部自我监督制约外，还需要来自外部的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所谓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指宪法和法律授予的权利主体对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制约，如人民群众、人民政协和新闻媒体等权利主体对人大、政府、司法机关以及执政党等权力运行机构的监督制约。在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认为，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是权力的授予者，人民及其代言者政协和新闻媒体有权监督制约被授权者。因为权利的主体非常广泛，因而其监督制约的时空范围也非常广泛，运用得当，可以随时随地严格监督制约权力行使者的用权行为。正因为如此，习近平非常重视这种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在谈到人民的监督时，他告诫全党：“我们要珍惜人民给予的权力，用好人民给予的权力，自觉让人民监督权力，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使我们党的根基永远坚如磐石。”^② 习近平还把人民监督与跳出历史周期率紧密联系起来，他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是无所不在的监督力量。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③ 人民政协是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在参政议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民主监督等方面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人民政协民主监督，重点监督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④ 新闻媒体也是加强权利对权力监督制约的一种重要手段和渠道，尤其是在信息化时代，新媒体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大。2016年4月，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明确强调：“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成为发扬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的新渠道。”^⑤

三是加强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所谓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指权力结构系统中一部分权力机构对另一部分权力机构的监督制约，如人民代表大会对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监督制约等。如果说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是一种较为柔性的监督制约，那么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则是一种强制性的刚性监督制约。相对于柔性的权利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刚性的权力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更为制度化、常态化，因而力度更大，效果也更为明显。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是我国的最高决策机关和立法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③ 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6页。

机关，也是最高监督机关。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发挥人大及其常委会在立法工作中的主导作用，健全人大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支持和保证人大依法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决定权、任免权”^①。中央到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的建立更是近年来我国权力监督机制改革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新建立的专职权力监督机构，针对过去监督机构分散、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的弊端，将其设置于人民代表大会之下，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权力监督机构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对此，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做了深刻论述：“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②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内权力监督制约以及权利对权力监督制约等一系列论述，初步构建了既有内部监督又有外部制约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为破解历史周期率千古难题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全面从严治党：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实践探索

古往今来，一切以追逐个人权力和利益为目标的封建统治者，因为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最终都未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陷阱。在当代中国，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则主要取决于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③“党领导一切”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责任。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履行好这样一种责任，关键在于能不能全面从严治党。只有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使广大党员干部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才能从根本上跳出历史周期率。

破解历史周期率难题，不仅仅是一个需要研究的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需要艰辛探索的实践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这一问题的新探索，不仅在理论思考、制度建设等层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在实践层面也进行了许多新探索，取得了不少新成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切入点，坚持持续高压反腐和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提高执政党“自我革命、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能力，以确保党的先进性和革命性，有效探索出一条破解历史周期率的实践路径。

1. 勇于自我革命

一个执政党能不能清正廉洁，巩固其执政地位，从而顺利跳出历史周期率，既取决于外部因素，即敌对势力的颠覆，更取决于内部因素，即自身机制是否强健。邓小平在苏共垮台后不无担忧地说：“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④今天来看，影响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主要因素依然不在外部而在内部，尤其是在执政党内部。如何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难题？如何回答邓小平的这一历史之问？这是我们今天不能回避的必答题。对此，习近平给出了掷地有声的回答：“自我革命。”他反复强调：“勇于自我革命，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全面从严治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8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5-326页。

党永远在路上。”^① 习近平的回答既是对我们党过去勇于自我革命优良传统的经验总结，也是今天我们党应对历史周期率难题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党具有勇于自我革命的优良传统和巨大勇气，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其能够保持长盛不衰、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原因和关键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党肩负的历史使命愈加繁重，面临的挑战和风险也更加复杂，更需要具有自我革命精神和过硬的自我净化本领，否则就可能重蹈历代封建王朝“其兴也浚焉，其亡也忽焉”的覆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开展了党的历史上力度最大、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的从严治党活动。首先，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意志狠抓作风建设。从党的十八大闭幕后不久颁布“八项规定”到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从倡导“三严三实”到推进“两学一做”，党中央一步一个脚印地加强作风建设。其次，“老虎”“苍蝇”一起打，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腐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以“猛药去疴”的决心和“刮骨疗毒”的勇气开展轰轰烈烈的“打虎”“灭蝇”“搜狐”行动，切实做到有腐必反，除恶务尽。短短5年，中央就立案审查省、部、军级以上党员干部及其他中管干部440人；厅局级干部8900余人，县处级干部6.3万多人，处分基层党员干部27.8万人，形成了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态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在拉下的大“老虎”中，正国级1人，副国级6人，十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43人，中央纪委委员9人，部队少将以上将军70余人^②。同时，还发布《北京反腐败宣言》，主动搭建追逃追赃的国际合作平台，加强不同国家之间的反腐败合作，将逃到海外的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勤于自我完善

从严治党，兴利除弊，既需要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和底气，也需要勤于自我完善的制度和机制。“刮骨疗毒”和“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精神解决的是如何坚决铲除危及执政党生存和发展的权力腐败现象，而不断推进权力制约监督的自我完善是预防执政党权力腐败，永远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制度机制保障。前者是治标，后者是治本，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跳出历史周期率陷阱的问题。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坚决纠正各种不正之风，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③ 也只有通过不断自我净化、自我完善，才能达到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目的。习近平这段话充分说明“自我净化、自我完善”在全面从严治党，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中的重要作用。

勤于自我完善是执政党顺应时代变化的必然选择，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必要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勤于自我完善的自觉性越来越高，自我完善的力度也越来越大。毋庸讳言，有些涉及重大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完善是有潜在风险的，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某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切身利益。但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必须勤于自我完善，不断健全和完善各种体制机制，进一步夯实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制度基础。首先，构建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是遏制权力腐败的关键环节，也是破解历史周期率的重要举措。在2013年6月28日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特别强调：“把好干部选用起来，需要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要紧密结合干部工作实际，认真总结深入研究不断改进，努力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

^① 《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工作 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日报》2018年1月6日。

^② 参见《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30日。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的制度机制。”^①要构建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还必须有一套科学的选人用人标准，对此，习近平还明确提出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②的好干部标准。只有不断完善科学有效的选人用人机制，严格坚持科学的选人用人标准，才能实现选人用人的公平公正，真正做到为巩固政权、跳出历史周期率集聚优秀人才。其次，完善和落实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内权力的正常有序运行，取决于党代会制度是否科学完备。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落实党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实行代表提案制，健全代表参与重大决策、参加重要干部推荐和民主评议、列席党委有关会议、联系党员群众等制度。更好发挥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及委员作用。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情况反映制度，畅通党员表达意见、要求撤换不称职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渠道。”^③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提高了工人、农民代表比例，落实和完善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任期制、党代会代表提案制，还健全完善了关于各级委员会和委员参与重大决策等相关制度，使得党代会制度越来越完善。再次，建立健全惩治腐败与预防腐败相结合的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看一个政党或政权能不能长治久安，或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还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在权力运行中有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反腐倡廉长效机制。在党的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国家战略和顶层设计”，“各项改革举措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堵塞一切可能出现的腐败漏洞，保障改革健康顺利推进”^④。通过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完善，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并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预防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仅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和完善各级反腐败协调小组职能，还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推行新提升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等，从而进一步完善了反腐倡廉的长效机制。

3. 善于自我革新

从规范权力运行的角度来说，“刮骨疗毒”的自我革命和制度机制的自我完善是解决权力腐败和提高执政能力的前提，而理论与实践的自我革新则是确保执政党长盛不衰和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作为一个富有自我革新精神、有着善于自我革新优良传统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伟大历程中，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坚持自我革新、善于自我革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依靠自身的革新精神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战胜了各种艰难险阻，使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必须看到，跳出历史周期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借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按照习近平所提出的既要有理论创新又要有实践创新。只有真正实现了党的自我革新，才能使党始终保持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和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实践充分证明，善于自我革新不仅是党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和传统优势，也是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和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法宝。

党的自我革新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更是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新时代，党中央提出增强“四自能力”的号召，尤其是“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毫无疑问成为增强“四自能力”的重中之重。新时代如何有效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是关系党最终能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环节。在党的自我革新中，首先是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随着十八大以来改革的不断深化，党治国理政的理论创新成为必然要求。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

① 习近平：《建设一支宏大高素质干部队伍 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人民日报》2013年6月30日。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12页。

③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建》2016年第11期。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94、395页。

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坚持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怎样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要时代主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②。这个重大理论创新成果的诞生，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理论支持。其次是实践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正如习近平所说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③ 实践创新需要新的理论引导，理论创新最终也要体现到实践创新之中。习近平多次强调：“一定要有自我革新的勇气和胸怀，跳出条条框框限制，克服部门利益掣肘，以积极主动精神研究和提出改革举措。”^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会后成立了多个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了几十次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通过了1500多项全面深化改革具体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各领域全面深化改革实践的创新和发展。这些改革实践的创新和发展，既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也从实践层面为破解历史周期率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具体对策。

参考文献：

- [1] 陈先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历史周期率问题》，《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
- [2] 王传利：《“延安窑洞对”论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 [3] 马小芳：《中国共产党加强先进性建设的当代创新——有关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
- [4] 刘兴旺、郭文亮：《从对历史周期率的回答看毛泽东的民主执政思想》，《理论探讨》2013年第3期。
- [5] 齐彪：《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与跳出“历史周期率”》，《党的文献》2017年第3期。

（编辑：张 桥）

更 正

本刊2019年第3期第156页和封三照片中的“北京科技大学党委书记权良柱”应为“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权良柱”。特此更正。

《马克思主义研究》编辑部

2019年4月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6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19页。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④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509页。